北国风

高粱地打乌米

□赵富

鱼米之乡的肇源,水美土沃,绿色高粱秆上长出的乌米味道鲜美。几十年前,还是生产队的年代,在高粱正欲含苞吐穗的季节,我跟着大人们去肇源串门儿。在南街市场转悠时,无意中发现拐角处有个小朋友,正蹲在小筐前用求助的目光盯着我。筐里装着很多根高粱叶子包裹的绿色小包包。他告诉我:“这是肇源的高粱乌米,非常好吃。”

市场奇遇,让我的幼小心灵对肇源乌米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当时,母亲花了三分钱给我买了一根。我按照小朋友的示范,扒开叶子,咬口白色小棒棒,还真好吃,解馋过瘾。后来,我又从大人那儿知道,在肇源大地生长出乌米的农作物里,常见的有高粱、玉米、谷子等几种,而且高粱乌米为最佳的,受到世代江湾人的青睐和喜爱。

高粱乌米,是高粱在萌发期受病菌侵染芽鞘所产生的一种病害,椭圆形孢子堆寄生于高粱穗上,被民间称为高粱丝黑穗病。此病穗多为播种时,高粱种子略有发霉,窜穗便秀出乌米;再者是在高粱孕穗季节,如遇到连续的阴雨天,高粱芽鞘受到细菌侵染,也是容易长出乌米。

苍苍茫茫的青纱帐,绿野无际,多一枚鲜美可口的乌米,就少一棵红似火把的高粱穗。虽然如此,高粱乌米还是不失为舌尖上一道天然绿色保健食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淀粉及矿物质等营养物质,尤其含维生素、真菌多糖、微量元素硒以及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等功能因子。它能生吃,扒开叶子,则可以当瓜果品尝;它能熟吃,放在锅里蒸,撒上些许盐,口感和味道会更好些;它可蘸酱吃,也可打熟酱吃……同时,乌米还可入药,对于月经不调、血崩便血等症,都有很好的疗效。

乌米的外貌,很有独特风格。嫩的时候,像根粉笔,小巧玲珑;老的时候,则又像支毛笔,苍劲厚成。刚刚打包的幼嫩乌米,外皮让绿叶子全部包裹着,剥开叶子则呈现出嫩嫩的白色小棒,与粉笔粗细大小相似,其肉为白中带点微微的甜味,口感细腻,很好吃。

东北高粱地里打下的乌米。

我来到肇源乡下亲属家,选了个晴朗的天气,和东西院的几个小朋友结伴,去松花江边的一片高粱地打乌米。而其中的一个伙伴,正是在街里市场拐角处卖乌米的小朋友——东院的臭蛋。我们一人一条垄沟,行进在高粱地的绿色波浪之中。这时,臭蛋为了调解沉闷的空气,先出了个谜语找乐,边寻找乌米边让我们猜。他说:“顺着垄沟往里走,歪着脖子往上瞅,眼珠子死死盯一块儿,见到大肚子就下手。”我们一群小伙伴一听,个个乐得前仰后合,一阵阵笑声在广阔青纱帐回荡……

在打乌米的小伙伴中,我的个子最高,他们喊我“高粱秆”。打乌米,原来是一场智慧的角逐。如果技巧掌握娴熟,取胜的概率就会高些。判断乌米的“老”与“嫩”,要用手指去捏绿叶包裹的高粱苞,靠感觉判断:如果包硬,则是乌米老了;而如果包软,则是嫩的乌米。那么,判断“乌米棒”与“高粱穗”呢,也要用手指去捏绿叶包裹的高粱苞,也靠感觉来判断:如果苞散,则是高粱穗;如果苞硬、苞软,便则是乌米了。

当我们从高粱地钻出来的时候,每个人身上都落了一层高粱花子和秆叶上的白粉。在地头上,我们比试一下战利品,我是最大的赢家。我先挑选几个嫩棒给二丫和三姑娘,又挑一个硬棒给了臭蛋。臭蛋不管老嫩,扒开皮就咬一口,吃得满嘴乌黑一片。二丫挖苦他:“像黄皮子一样,嘴巴都黑了!”而臭蛋却不好意思地抹下嘴角,从高粱地里出来本身就满头大汗,这一抹满脸就像画上“水墨丹青”了。三姑娘戏笑他:“见到大肚子就开口。”一时间,我们开怀的笑声,又冲进浩浩荡荡的高粱地里。

时光悠悠,白驹过隙。流年的青纱帐,早已成过往云烟,但那童年的乌米,却似盘根错节的一缕乡愁,让我终生难以忘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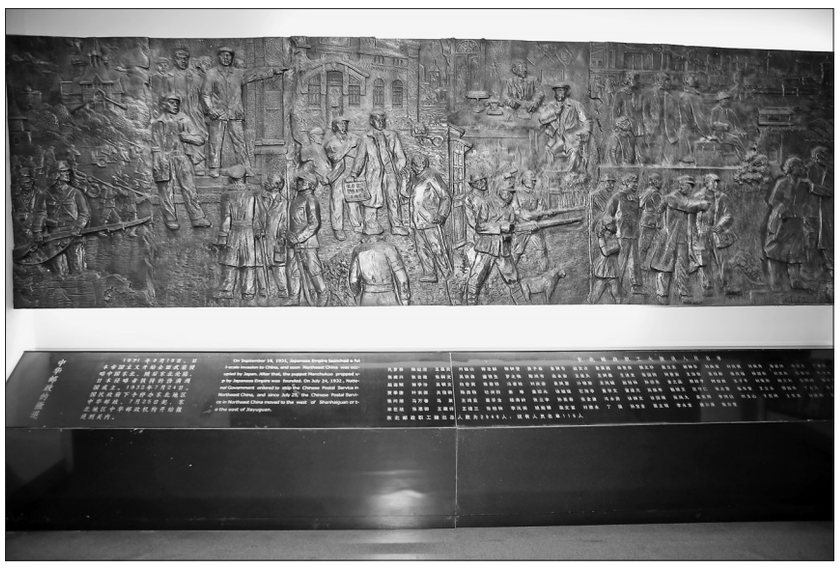
东北邮工大撤退

□冯前明

1932年7月,2585名东北邮工千里大撤退,誓死不当亡国奴,书写了正气长留人间的抗战篇章。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中华民族开始走向存亡绝续的边缘。正如抗日名将左权所言,“亡国灭种的惨祸临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当时东北三省的阴暗天空下,只有标志主权的中国邮旗在飘扬。

1932年3月,伪满洲国虽然成立,但作为国际邮联成员的中华邮政总局,其所属的辽宁、吉黑两邮区拒绝日伪的强行接收,维系着东北与国内国际的邮政通信。在举行所谓“开国”仪式后,日伪公开宣布,在伪满洲国境内的中华邮政,将统归其管辖。中华民国政府密令东北两邮区立即停办邮政,关闭东北三省的全部邮政局所,东北三省邮政员工依自愿撤退进关。东北邮工身处历史的重要时刻、重要节点,是不得已屈身日伪当亡国奴,还是民族利益至上、汇入全民族抗战的大潮?4月5日,东北邮工向全国邮界同仁和各社会团体发出火急罢工通告,维护中国尊严和邮政主权。通告中说:“日人卵翼之傀儡政府,丧权辱国,思之痛心。同仁切念国民矢忠之天职,为中华民族之尊荣计,为个人之人格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据吉黑邮区的员工回忆,当时由中华邮政、伪满洲国交通部、日本军方组成了调查组,定期叫邮工到马迭尔饭店听候询问。敌伪二人问:“你为什么要进关呢!这里有你的财产、家庭、祖坟和事业,况且,我们将以优厚的待遇请你来工作?”“是的,但是我自愿要走。”“还有别的原因吗?”“有,我不乐意当亡国奴!”



东北邮工撤退进关部分员工的浮雕和名单。

东北邮工冬季撑冰爬犁送邮件。

在沈阳邮政管理局撤退仪式上,邮务员萧祖荫宣读停办通知时,因悲愤而潸然泪下无法宣读。哈长铁路邮政车押运员何玉山,新婚刚满一个月,热土难离,却毅然进关参加抗战。当年哈尔滨市邮政局邮务员、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孔罗荪,亦弃家进关、流转西南,并执笔写下《最后的旗帜》一书,记录这悲壮的时刻,传递中华优秀儿女的魂魄,爆发出抗衡与奋争的怒吼。

2585名东北邮工,忍痛抉择,抛家舍业,千里流亡,共赴国难,正是他们的大义凛然,致使东北邮政全网瘫痪,予日伪以强有力的打击。

1932年7月27日起,东北撤退的邮工经山海关赴天津、北平、上海、青岛四地报到。其中天津成为当时撤退进关邮工最重要的集结地。笔者曾到天津邮政博物馆寻访相关史迹。据该馆提供资料介绍,截至1932年9月9日,在津报到的东北邮工共计1473人。早在8月4日,经天津邮务工会接洽,成立了天津各界招待东北入关邮工委员会,设立了第一寄宿舍和第二寄宿舍。这两个寄宿舍的电灯、锅灶、床铺及卫生等设施基本齐全。邮局和邮务工会派接待人员手持“欢迎东北邮工入关”的横幅,昼夜轮班到火车站接待入关邮工,然后将他们分别安置到两个寄宿舍和邮局腾出的空余局房。为防止疾病流行,邮局对包括两个寄宿舍在内的所有东北邮工聚居场所均发给消毒药品。招待委员会租用房屋建立了临时医院,并与市立医院接洽,对东北邮工适当减费施治。入关邮工在津待分配期间,暂时安排到天津各邮局工作。

史料记载,2585名入关抗战的东北邮工,相继由总局分配到北平、上海、山东、河南、江西、浙江、甘肃等地工作。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文史中心,笔者看到一份当年入关抗战的老邮工的回忆资料。那是经历了哀伤、挣扎和风雨、雷电,在当时特殊的生存环境中写下的文字:“我自1927年考入邮局以来,勤恳工作四十余年,九一八哈埠邮工罢工,不为敌用不做顺民,入关不及叩别双亲,二老惨死未能奔丧。最后调至九江局,每动均遵调令……枪林弹雨中维持抗日前线邮运畅通,九死一生,家虽破人未亡却人间惨痛备尝。”“扪心自问,尚无愧对国家……”

日本武装移民侵略罪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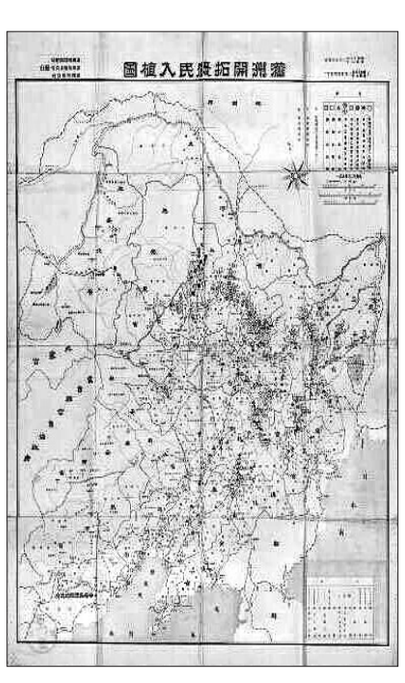
□戴伟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一幅日本武装移民侵略罪证图——《满洲开拓农民入植图》,该图为纵106厘米,横79.5厘米,二百万分之一比例尺图,并分别用中国里、日本里和米突(国际公制)三种比例尺标注,是在昭和15年(1940年)《满洲开拓农民入植图》的基础上分别用黑、红、蓝、褐等四种颜色套色印刷。昭和16年(1941年)伪满洲国开拓总局、满洲拓植委员会、满洲拓植公社联合出版发行。图中用红色圆圈标注集团开拓民移住地,红色圆圈内的数字表示入植的次数。昭和16年之后的移民,用褐色圆圈加褐色十字标注表示集团开拓民特设农场所在地。用褐色圆圈加褐色一字标注义勇队开拓民移住地;用褐色圆圈加褐色合字标注集合开拓民移住地。馆藏《满洲开拓农民入植图》标明了第一次至第十次集团开拓移民和各集合开拓、各种青年义勇队、各满铁自警村以及各满铁训练所等360多个移民开拓团在中国东北的具体位置。图中显示当时的伪满洲国18个省中,有16个省被日本武装移民团入侵,只有热河省的8县6旗(地域相当今河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和兴安西省的3县6旗(地域相当于今内蒙古东南部),没有被日本武装移民团侵占。

日本向东北移民可分为“试点移民”(1905-1931)、“武装移民”(1931-1936)、“大规模移民”(1936-1941)和“最后阶段”(1942-1945)四个阶段。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省、拓务省以及关东军不断制定移民东北的计划,掀起了向中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高潮。1936年4月份的第二次移民会议拟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拟由伪满政权划出移民用地1000万町步,从1937年起的20年内,向东北移植日本农民100万户500万人。计划分四期进行,每期5年,第一期10万户,以后每期递增10万户。移民来源于日本,从农、渔、林以及城市失业者中,选择“思想坚定、身体强壮”者组成。5月,日本政府批准了这个计划。7月,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和板垣副参谋长联合发出通告,立即着手实施。1941年属于大规模移民阶段,他们在《满洲开拓农民入植图》名称上加了个“农”字,是企图掩盖开拓团武装分子的身份,掩盖“武装移民”的性质。但实际上从该图可见,移民依然含有武装性质。此外,在日本侵略者亲手书写的《关于佳木斯移民情况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表述:“作为拓务省实验移民,即移住吉林省桦川县的第一次日本人移民(以下简称佳木斯移民)423人,与9名指导员及来自拓务省、帝国在乡军人会本部的工作人员一同,于10月8日晨抵达大连港。10月9日,与在奉天北大营日本国民高等学校训练的70人汇合,总计502人,移民们自9日上午9时开始,在野战兵器厂的工作人员指导下操作兵器要领,下午2时,在射击场进行重机关枪及轻迫击炮的实弹射击。”

日本向东北地区的武装移民共有5次。参加第一次武装移民团的493人于1932年10月北上佳木斯,改称“佳木斯屯垦军第一大队”,下设4个步兵中队,12个小队,还有炮兵1队、机关枪1队。1933年4月,侵入伪三江省桦川县永丰镇屯居,后定名为“弥荣村”。第二次武装移民493人及8名干部强入依兰县的七虎力,建立了名为“千振村”的移民点。第三次武装移民团259人于1934年10月闯入伪滨江省绥棱县北大沟,组建“绥棱开拓组合”,后定名为“瑞穗村”。1934年2月,谢文东在土龙山组织农民起义,打死日本移民39人,成为轰动一时的“土龙山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移民团内部惶惶不可终日。为了给日本移民打气,1934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关东军在长春召开了“第一次移民会议”,西尾寿造在会议上强调日本向东北移民政策的“国策意义”。1935年5月,日本拓务省制定《关于满洲农业移民根本方案》,决定自1936年起,在15年内向东北移民10万户。

《满洲开拓农民入植图》非普通的伪满洲国地图,也非一般的侵华罪证,而是昭示日本侵华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成为日本拓务省策划对我国东北武装移民侵略的铁证。



满洲开拓农民入植图。

龙档珍存

本栏目稿件由黑龙江省档案馆提供

那年那月 NANIANNAYUE

小镇照相馆

□马雁凌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我的家乡伊春市翠峦林业局只有一家照相馆,那是一家国营照相馆。就在那简陋的照相馆,照相师傅给我照了很多珍贵的照片,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

小镇照相馆坐落在翠峦林业局主街最热闹的中心地段,位于主道南侧。照相馆门楣上挂着一块一米多长、半米多宽的牌匾:翠光照相馆。翠,是地名的第一个字,光,很有诗意,也很贴切;那时,我们管照相叫拉光,若是想去照相馆拍一张照片,就说:拉一光。人们进出照相馆都带着骄傲与喜庆的表情。

照相馆门脸不大,一扇门,推开门进屋,迎面是前厅,大约十几平方米吧。右侧是营业室,一道柜台隔着顾客与营业员。顾客交款、开票、交票、取照片、等候拍照都在这个前厅。营业员开的票据卷烟纸般大小,一式两份,一份交给顾客作为取照片的凭据,一份贴在装照片的小小的纸袋上。

从进门一直往里走就是摄影室。摄影室陈设简单,几把木凳,几束褪色的塑料花以及逗小孩子的皮球等。地中间一副三脚架,三脚架上支着照相机,不拍照时蒙着一块暗红色的布;背景墙是永远不变的、已经很难看出颜色的幕布。即使这样,每当走进摄影室时,还是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照相师傅像导演似地,指挥要照相的人们或坐或站,一一就位,然后,站在照相机后面,瞄了又瞄,用那块红布把头一蒙,嘴里喊着:望这儿看:把一只手伸出来,一捏手中的小球:只听啪地一声:照完了!

那时,人们过日子都很仔细,哪有啥事没有就去照相的?照相要有个由头:小孩百天、小学毕业、中学毕业、亲人团聚、同志荣转、订婚、结婚、参军等,都是常用的由头。

小学二年级时,我当上了学习委员,二道杠。我知道这是值得纪念的大事,管妈妈要了两元钱,和几个班干部一起去了照相馆。我说:“照一张像多少钱?”那个开票的人居高临下地看着几个八九岁的小孩:“人像一寸4毛5!”我心想:“人像?难道狗还照相吗?”若干年后才知道确实有人像之说,确实有人给狗照相。她数数我们,说:你们这些人一寸的照不下,怎么办?我们几个人嘀嘀咕咕半天,才决定照一张二寸的。开了票,交了款,才有资格进摄影室。照相师傅站在照相机后面,一会儿用一块褪色的红布蒙上脑袋,一会儿再把脑袋露出来,把我们看了又看,把队形拆开又合拢,这才说:“往我这看”。我们就一起往前看。只听啪地一声,照完了。照片上,六个小姑娘分两排,三个坐着,三个站着,抿着嘴,瞪着眼睛,齐刷刷地望着一个方向。还有,我戴着两道杠的胳膊很明显地支出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脱离父母视线去照相馆。小镇照相馆常常顾客盈门。那时,每当我有了4角5分钱时,就会到照相馆去,把4张一角的纸币和一个5分的硬币放在那个长条的水泥抹的柜台上:“照一张一寸的。”

乡村照相馆。

1969年5月份,我们即将毕业,那时,没有高中,我清楚地知道:告别校园的日子临近了,出了学校门就要与书包告别了。于是,我背着书包照了一张二寸半身照,又照了一张头戴军帽、身穿军装、腰扎皮带的二寸照片。那时,人们还常常要求照相馆在照片的上方或者左右空白处写上字,写什么由顾客自己确定:志在四方、学生时代、献给未来的回忆。现在想想:是的,所有的照片都是献给未来的回忆啊。

在我的影集里,有一幅特别珍贵的照片:我5岁那年夏天,父亲、母亲、我、妹妹我们四人的合影。照片上,父母并肩坐着,母亲怀抱着1岁多的妹妹,我穿着浅色布拉吉,梳着一个歪桃辫,依偎着父亲站立着,两只黑黑的眼睛探寻地望着前方。这是我们四人唯一的一张合影。这张照片几次丢失,失而复得后,我到照相馆翻拍、修片并扫描。现在,我把这张父母双全的照片存在电脑里、硬盘里,一家人在照片里永远地在一起了。

1975年,我所教的班级即将毕业,我也在寻觅新的工作单位,我意识到,我与我的学生们分别在即。于是,组织全班学生去照相馆拍了一张集体照。我常常望着照片上21岁的自己,望着那些十二三岁的学生。任凭思绪起伏湍流,是啊,我见证了他们的少年时代,他们目睹了我意气风发的青春时光。43年过去了,当年的学生都退休了。一位学生把这张珍贵的照片扫描发到群里,我一一辨认着,脑海里浮现出他们十几岁的样子。就是凭着这张照片,我的学生们联系到了那些久不联系的人。

此外,还有两幅照片也是不可多得的。1978年国庆节那天,我与男友在小镇照相馆拍了两幅2寸照片。画面是黑白的,我穿着米黄色尼龙衫,他穿着咖啡色尼龙衫,我们拘谨地微笑着,望着镜头,仿佛望着不可预知的未来。一样的服饰,一样的发式,不同的是一张横幅的,一张竖幅的。此后,再与他照合影时,已经走进了婚姻。

当年,林区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装照片的玻璃镜子。玻璃镜子里铺着彩纸,用胶水把照片贴在纸上,再把这贴满照片的纸夹在玻璃镜框里,挂在墙上最显眼的位置。这就是当时一般人家的主要摆设了。小镇照相馆,一位照相师傅,一架老式照相机,留下了多少幅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留下了多少人的人生瞬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的人买了照相机,小镇又有了个体照相馆,而且,随着交通越来越方便,人们更愿意到20多公里之外的伊春市区去拍照。小镇照相馆渐渐冷清,门可罗雀。不知哪一天,那块挂了几十年的牌匾不见了,小镇照相馆不见了。后来,就连那座房子也不见了。现在,那里已经是高楼林立,一片新面貌,再无昔日踪影。小镇照相馆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是,小镇照相馆拍摄的那些老照片却永远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扫描关注 | 北国风